作者漆侠分析宋学，不站在理学的立场上，或者说视理学为宋学的正宗，甚至是有意识的反对理学。这种观察的角度，今天也并不常见，但确实将理学视为宋学的一支，且只是在后期才有较大影响力的一支，更为接近事实。本文篇幅不长，只就梳理一个大致的脉络来说，完成得也算相当好了。下面就作者的分析，或作进一步的延伸，或提出一些不同看法。

①作者写：“宋学则指的是，在对古代儒家经典的探索中，与汉学迥然不同的一种新思路、新方法和新学风。”宋学实际上不止是对儒家经典的探索，因为宋儒们不仅要申发出先贤的本意，还要求出新解，创新篇，所以钱宾四说宋儒接近了先秦诸子的精神。而由于汉学所发展的训诂也并非全无用武之地，宋学也部分吸收了汉儒的方法，“迥然不同”实际言之有过。

②由于王介甫的《三经新义》等思想性的学术著作未能流传下来，“荆公新学”的具体面貌，难为今人所知。也是因此之故，近代学人论述宋人思想时，或是直接忽略介甫的新学，或是粗略的提一两句，这完全不能与新学在当时的显赫地位相称。常常造成误解，让人以为北宋时理学便已经独步于学林。作者通过仅有的一些材料，试图复原介甫哲学思想，或许不能够对“荆公新学”有完整的展现，至少也可管中窥豹，瞥见一斑。关于“新学”最明确的一点，是介甫站在儒学本位的基本立场上，对儒家外的诸子学说博采众长，尤其重视佛道两家的思想，且不取理学家入室操戈、取而代之的态度，而是兼容并蓄、“唯理求之”。这一特点也为其他学者所指出，应当可信。或许介甫的思想建构并不成功，但这样开放、包容的精神，却不见于宋亡之后的学术之中。纵然中国独自发展近代科学体系仍极为困难，但若是西学东渐的时候，吾国吾民有介甫时代之精神面貌，则亦与今日大不相同也，此诚可叹惋矣。

③作者以为，高宗出于将北宋亡国的罪责推卸给王安石变法的目的，故打压荆公之学，进而倾心于二程的道学，这成为了理学在南宋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。但据余英时研究，秦桧实际上是主王氏之学的，而高宗也有“不拘一家之说”的表示[[1]](#footnote-1)，至少在秦桧主政时，即高宗朝的大多数时间里，理学都是不占上风的。而且理学家如朱熹也并不是趋炎附势之辈。将理学的发展与卖国投降的高宗联系在一起，大体还是出于作者对理学的偏见。

④在朱熹集理学大成，大展理学光辉的同时，与其理论相对立的浙东事功派则当然难以得到后人的关注。虽然这一学派最终确实没有在理论或实践上取得多大的成就，但其继承了北宋重“外王之道”的学风，与理学专情于“内圣”有着鲜明的差异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浙东学派有着重要的价值，反映即使在南宋学术界，除却余英时所说的“官僚集团”外，还存在着其他对理学主张的反对声音，其最后的失败和理学的成功，都颇能说明一些问题。

⑤固然作者试图展现宋学各家的真实状况，但由于作者对理学所抱持的相当大的敌意，理学实际上遭到了作者的误解。这对理清宋学发展的工作来讲，不得不说是相当大的限制，作者一下从一个极端又偏向了另一个极端。但作者对理学的有一点指责倒是确有见地：理学家大多从比较狭隘的眼光去认识“道”，把作文看作“玩物丧志”，诗歌是“闲言语”，正为后来思想的禁锢、拘束枯燥的文化氛围埋下了伏笔。而这一严正得过头的作风，似乎又是中古基督教会的近亲。

1. 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，卷一七三 [↑](#footnote-ref-1)